

跨國界的文化傳釋
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
文明史觀論

徐興慶 著

四明文庫研究叢刊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
史觀論 / 徐興慶著. — 寧波：寧波出版社，2022.12
ISBN 978-7-5526-4872-0

I . ①跨 … II . ①徐 … III . ①朱舜水(1600-1682)
- 人物研究 ②中日關係 - 文化交流 - 文化史 - 研究 IV .
① B248.995 ② K203 ③ K313.0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22) 第 255044 號

版權合同登記號 圖字：11—2022—323

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

徐興慶 著

策劃編輯 袁志堅
責任編輯 王 蘇
責任校對 陳 鈺
裝幀設計 金字齋
責任印製 陳 鈺
出版發行 寧波出版社(寧波市甬江大道1號寧波書城8號樓6樓)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張 21.75
字 數 278 千
版 次 202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26-4872-0
定 價 120.00 圓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序 一

對歷史、學術與思想的雄鑑

朱舜水是明末清初時期的大儒，是日本儒學乃至東亞儒學的開山祖師。他旅居日本長達二十二年，生前逝後對日本思想文化史有重大影響，在日本聲名甚隆，然在中國知之者不多。我在東京旅行途中，就曾看到豎立的“朱舜水先生終焉之地”的木牌，這是地標，是思想文化交流的津梁。

徐興慶先生精通中日文化，矢志舜水學，是非常了不起的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和朱舜水學研究的大家。徐先生德業雙修，學思並進，自1985年至今，以學而不厭、努力鑽研的精神，孜孜矻矻、矢志不渝地尋找、發掘朱舜水資料，潛心爬梳、董理朱舜水先生的生平、傳略、事蹟與思想，及其在日本的傳播史，特別重視對舜水先生的哲學、政治、經濟、宗教、歷史的觀念及其發展變化的深入研究。

徐先生從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的角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舜水先生在德川時代扮演的文化傳播者的角色及定位。朱舜水先生與德川前期的朱子學者、陽明學者乃至古文學派學者都有往來，與日本儒教的發展有密切聯繫。朱舜水先生對教化德川的民間社會及教育制度的建立，做了多方面的工作，貢獻卓著。

本書史料豐富，扎實厚重，作者檢擇得體，重點突出。作者把朱舜水放在中日文化史、儒學(教)史的背景上作深入的探討，尤其重視德川前期日

本儒教的“雜學性”。要理解朱舜水，不能不理解水戶藩的漢學教育與實踐、陽明學在日本的傳播及演化、加賀藩的儒教傳播、日本的近代化及史觀的演化，對如此繁複的諸問題，作者作了詳盡的研討，並明晰地表達出來。作者十分重視細節，如關於兩“戴笠”的考證，非常細膩，尤見功夫！

本書共十二章，先總論，後分別論述了朱舜水與留寓日本的明末文人的交流、與德川儒教的發展、與熊澤蕃山“經世致用”思想的異同、與加賀藩儒教的發展、從東亞視域看隱元與朱舜水的文化傳播、對科舉制的評論、“儒、釋、道、醫”的獨立與中日文化交流、《本朝通鑑》及《大日本史》史觀演化、《大日本史》與日本“水戶學”的重建、水戶藩與日本的近代化、和辻哲郎的傳統與“近代”思想的轉化。

掩卷凝思，拙見以為，徐先生這部大著至少有如下特點：

第一，跳出藩籬。近幾十年以來，中日韓學者深論“作為方法的東亞”。所謂“文化的東亞”“思想的東亞”，具有跨文化的特徵，此中有著多樣性與差異性，它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徐著主書名為《跨國界的文化傳釋》，實際上不僅跨國界，而且跨文化，在跨文化方面可圈可點。

作者不是就事論事地微觀討論，而是跳出論主，跳出中方、日方的壁壘，以東亞和東亞文化、東亞儒學及其交流史為場域，為背景，來討論朱舜水先生的見弊得失，包括貢獻與局限。作者精心思考，小中見大，大中見小，相得益彰！

朱謙之先生曾指出，朱舜水的歷史觀與治史的態度與黃宗羲等開拓的“浙東史學”有一致性，對日本水戶學的發展有一定影響。作者並不限於此，一方面在本書中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另一方面又從比較的視域考察日本陽明學熊澤蕃山的思想體系，檢視他與朱舜水經世致用的實學理念的異同。

面對朱謙之先生對朱舜水的全面批評及對朱舜水內在矛盾的揭示，本書作者作了深度的回應，蓋棺定論，確證朱舜水是德川社會傳播“經世致用”理念的先驅者。這一點絕不可掩。

第二，史論結合。陽明學在日本的傳播與演化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現今坊間仍在爭論，是否誇大了陽明學在日本的影響與作用，特別是在明治維新時期的作用。我想關鍵是拿材料來，實事求是。誇大其辭固然不對，

然而如有其人其事，而又不願承認，也不對。本書詳論中江藤樹如何由朱子學者轉為陽明學者，其弟子如何促進了行動主義的陽明學的流行，明治維新的重要指導者西鄉隆盛又如何從陽明學中肯定主體性與個體的行動力，有史有論，史論結合，不虛誇，不縮小，令人信服。

第三，問題意識鮮明。本書作者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全書涉及中日思想史上各學派諸多爭論的問題。

“儒佛交會”是一大問題，尤其在朱舜水先生的交遊中表現得很突出。朱舜水留寓長崎時期，正是臨濟宗黃檗派在日本快速發展的階段。當時多才多藝的明末文人頗受日本產、官、學界之青睞。面對“遍地皆佛”的風潮，朱舜水立場堅定，因為他力求把最有利民生的學問傳到日本。

有關“實學”，如何定義，如何判定？在今天的中國思想界，也是見仁見智的一大問題。本書通過詮釋“實學”理論與實踐準則的差異，思考傳統與近代之間的轉化及日本近代化的啟示，確有見地，極富啟發性。

本書作者認為，朱舜水推動的學問是從“作為學的實學”（倫理·祭禮思想、經世思想、教育思想），跨到“作為機能性的實學”（農業技術、製衣、飲食文化），在日本將儒家“利用厚生，救世濟民”的實學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本書特重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非常有價值。第十二章專論和辻哲郎的傳統與近代思想的轉化，討論了傳統的回歸與批判之背景，全章以“思想轉化”作為問題意識，用來解讀和辻哲郎在論述同一件事時，為何常有前後不一致的現象，當然重點是論述傳統“日本文化”與“近代”思想的關聯性。

沒有學術的思想是空洞的，沒有思想學術是盲目的。徐先生把兩者有機地聯繫起來，他做的是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

黃遵憲為朱舜水寫的詩曰：“海外遺民竟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終身恥食興朝粟，更勝西山賦《采薇》。”通過本書在中國大陸出版，海外遺民朱舜水先生的靈魂回歸中國，回歸故里，讓更多的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瞭解、學習，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因此我們特別要感謝徐興慶教授。

徐興慶先生為人謙虛謹慎，為學一絲不苟，他勤於讀書，精於思索，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有特別大的建樹。他專心治學，終於在經年苦修的基礎

上，著成皇皇大著，令人欽慕不已！欣悉徐先生現擔任臺灣著名大學校長之職，培植校風，砥礪品德，教書育人，提攜後進，謹此致賀！

衷心祝福徐教授的這一優秀學術成果問世，企盼他有更多佳構奉獻給中日學術界。

承徐先生不棄，命某作序，未能登堂入室，略抒胸臆而已，謹此奉答，愧不敢當。是為序。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 郭齊勇

2021年秋於武昌珞珈山

序 二

序城北徐公新作

徐興慶教授的新作《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即將和由他與郭齊勇教授主編的《朱舜水集》一道梓行面世。在學界浮躁，很多人都忙於標新立異和快速成名的時代氛圍裡，寧波出版社能隆重推出一位三十年來矢志於一個人物且碧落黃泉於該人物全史的學者著述，實在是令人稱奇，惟此亦無法不讓人斂衽讚述焉。

中國和日本有一種奇妙的關係。歷史上，每當大陸政權發生鼎革時，總有一批人要浮槎東渡，亡命於三島。有人曾半開玩笑地說，孔子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時就已經萌生過此念。其後，果有“避秦時亂”的東向移民潮，有宋元鼎革後佐鎌倉御蒙古的無學祖元，甚至在近現代湧現出“大江歌罷掉頭東”的一大批救國志士。明清鼎革後助德川興文教的朱舜水，無疑是上述歷史脈絡中的重要一員。由於是前近代人物，於是，在“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發生斷裂時，他選擇了前者這一前近代知識人的通常價值取向；又由於是毗鄰近現代的前近代人物，於是，朱舜水對日本人在“華夷”價值上強調有加的“日清”文明之別，卻最終演變成“國民”區隔下的“日中”國家之爭。他與德川光圀討論“中華大道”在“近世中國不能行之而日本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為易”時尚無法預料的國勢逆轉場景，二百年後竟真切地出現在明治維新時期和後藤新平為《朱舜水全集》所作

的序言中：“若使地下之之瑜，知我方今之駕馭盛運，其當拊躍不知屐齒之折也，若更令有知禹域亂餘之危局，其或拊膺而長嘆太息歎！”

由於是這樣一位給日後東亞大局之翻轉埋下過遠因和伏筆的人物，所以朱舜水在客觀上的複雜度恐怕會遠超我們的想象；其生前散落於日本各地的各類資料，也幾乎無人敢說已被悉數窮盡。於是，稻葉君山以《朱舜水全集》命名其所輯朱氏文稿的行為，便顯得十分冒險；而徐興慶教授用去大半生精力在日本苦尋朱舜水遺篇的訪碑問帖功夫，深刻地表現出一位研究者對於資料搜集這一歷史學生命線的無比珍視品格。

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日本除官方所藏圖書外，還素有私家保存文物的傳統。這意味著，徐教授有許多關於朱舜水及相關人物的未公刊資料，都是通過私人往來、感情交流和日復一日的不懈努力才逐漸獲得的。有多少幾近“程門立雪”的訪求經歷和感人故事，至今仍令人歎歎不已，難以忘懷。正因為有這種長期而連續的發現和積累，徐教授不但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了《朱舜水集補遺》（1992年），還在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了《新訂朱舜水集補遺》（2004年）。不寧唯是，他還組織包括大陸學者在內的東亞相關研究者，在徵得水戶“德川博物館”館長德川真木女史的同意後，連續三年赴日調查了朱舜水的相關珍貴資料，並整理出版了《朱舜水文獻釋解》等三部博物館藏品錄（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德川博物館）。

德川博物館，舊名水戶彰考館。現藏有水戶德川家歷代藩主，彰考館館長、館員，明末遺民、僧侶，以及早期切支丹信者的生前文物、文獻共計五萬餘件，且三百年來從未對外公布過。此番公開的是朱舜水與長崎、朱舜水與德川光圀、朱舜水及其弟子遺著、朱舜水的書詩與畫、朱舜水與禮儀祭祀等五大項相關文獻，涉及文集、遺著、書簡、畫卷、對屏、印譜等各式各樣不同的內容。2013年9月，以徐教授為組長的調查組發現了被認為已亡佚百年之久的中華一級文物——“監國魯王與貢生朱之瑜敕諭”原件。這是一個引起了轟動的發現，因為很快調查組在水戶博物館和東京湯島聖堂舉行了有日本前政要、中國駐日本國大使館官員和東京大學教授等人參加的新聞發布會和學術報告會。調查組的工作也因此受到了普遍的讚譽，有學者甚至說，這種調查本身就是“創造歷史”。

這大概也是讀者在閱讀徐興慶教授這部著作時之所以會有新意迭出和回味無窮感受的根本原因。由“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跡與思想傳播”“德川前期日本儒教的‘雜學性’”“水戶藩的漢學教育及其發展”“王陽明學說在日本的傳播及演化”“朱舜水對加賀藩的儒教傳播”“日本的近代化及史觀的演化”等六部類、十二章組成的這部鴻篇，以翔實的資料、嚴謹的邏輯、清晰的脈絡、立體的畫面、通達的點線和客觀的規律，為人們展示了一幅以朱舜水為核心的近世至近代中日人物文明史觀長卷，是近年來相關領域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巨製佳作。在臺大訪問期間，我曾多次拜訪過徐教授和他的研究室，見書架上堆滿了他當年歷經千辛萬苦從日本各家研究機構和寺社中搜求的發黃了的紙質資料，並與他交流過將如何使用這些資料等問題。從本書中許多見所未見的珍貴內容看，該書不僅僅是對那段中日學術交流史的客觀呈現，更是對沉睡數百年資料的新發掘和新展示。其對朱舜水與加賀藩之間密切關係的描述，對隱元所攜黃檗宗對日本宗教觀之影響等高論，均係常談中見新意，諳熟中所不曾聞。在方法論上，僅僅看第八章有關戴曼公的論述，既可見全豹之一斑——“本章主要依據在日本各公私立圖書館、鄉土史料館、寺院取得的新史料，追尋其生涯軌跡，深入考察戴笠在中國時的‘鄉里營生時期’（1596—1653）；東渡日本後，初始的‘尋出路時期’（1653—1654），以及皈依成為獨立性易後的‘侍僧時期’（1654—1658）、‘閉關時期’（1659—1662）、‘行醫時期’（1663—1672）等五段時空。希望循序漸進地考證戴笠（獨立性易）在不同身份、不同時空下的事跡與交遊情形，以釐清其人格特質及思想轉化，進而闡明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歷史定位……”而尤為重要的，應該是徐教授在水戶學分期上所提出的新說及其學術貢獻。根據他的研究，以《大日本史》為代表的“前期水戶學”與以《弘道館記》為標誌的“後期水戶學”之間，事實上存在著以立原翠軒等人為代表的中間過渡段，而這個階段應該被命名為“中期水戶學”。

徐興慶教授治史，由人物而人脈，由人脈而文脈，由文脈而時代，由時代而規律，由規律而性理。所披所揀，洪纖有致，所思所想，高遠信實。身為祭酒期間，力行校務改革而不妨學問，殊可貴也。猶復重視兩岸交往，甫一就任校長，即遍訪大陸各姊妹學校，廣結學緣。

追憶這些往事或許已超出了學術討論的範圍，但知其人而論其書，又何嘗不是中華傳統的題中應有之義？一個月前，徐教授來函徵余小序。我性鈍拙，本無格忝側，又不敢以不敏辭，故躑躅再三，方不揣淺陋，惴惴然續貂於後。倘有心者能藉此以入堂奧，則小生幸甚，學術幸甚。

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 韓東育

2022年6月28日

序 三

知識重構與經世致用

徐興慶教授新書《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刊佈，是東亞研究的又一喜訊。徐校長雅囑撰《序》，筆者深感榮幸，謹從個人與徐校長的學術因緣談起，略述個人對東亞研究背景與前景的觀察如下。

徐校長早年留學日本，除博覽日本語文學術文獻外，尤其注意浙東餘姚思想家朱舜水（之瑜，1600—1682）與江戶日本政治學術的密切關係，而致力搜羅舜水文獻，實為巨眼。其編著《朱舜水集補遺》於1992年問世（臺灣學生書局），廣受學界注目。2000年後，徐先生受聘於臺大日本語文學系，與筆者有同事之誼，因研究領域相同，初識之始，即傾蓋如故。2003年，徐先生受筆者之邀，加入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的東亞文獻研究計劃，精益求精，於2004年出版《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大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2006年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成立後，徐先生續為研究院的中堅份子，又領銜創立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並在臺大出版中心創立“日本學研究叢書”。自2018年榮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後，徐校長於兩年內即在該校成立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推動東亞人文學及社會科學不遺餘力，成果豐碩。在上述大背景下考察本書的結集，不難讓讀者深深理解到本書“緒論”宣示“東亞文明發展”以及“新的文明發展史及史觀

演化的系譜”，實具有深厚、複雜而豐實的學術背景。

要討論本書撰著的緣起與意義，更不能不將目光放遠，盱衡近三十年來東亞研究、亞洲研究、區域研究浪潮的發展，以及跨領域學科知識的交涉。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原延續歐美早年的遠東研究(Far Eastern studies)，而著眼將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地縮合為一區域，考論其中國家互動、文化交流、宗教禮俗等各方面的同與異，與東南亞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皆屬近二十年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深耕有成的重要領域。全球化浪潮興起後，尤其是1994年GATT改組為WTO，各國致力於打破貿易壁壘，進而利用國際網絡加強團結，而蘊釀了後來的東協(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2004年的“十加一”(中國加入)和2005年的“十加三”(日本、韓國加入)的成立。在這些政治經濟版圖的合縱連橫之下，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議題亦興起，並廣泛加入討論。區域之內文化與文明的糾纏，更是全球大江大海浪湧下的暗潮，既種下衝突撕裂的因子，也促進潛移默化的交融。由於二十世紀末跨領域研究的擴大與深化，東亞研究也好，亞洲研究也好，區域研究也罷，都不再是人文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各行其是，而是更著眼於文化、歷史、民族、經濟、海洋、貿易、政治等相互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流散”(Diaspora)成為熱門研究主題，縮合種族、海洋、婚姻等課題，說明了學界的新關注點；又如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的研究被置於城市化(urbanization)的脈絡上進行，亦說明了知識整合的新趨勢。由上述的大背景可見，東亞人文學的研究，雖然必以人文關懷為主，著眼於思想文化，但同時也已擴大到社會、政治、建築、旅遊、城市規劃等新課題，庶幾能縱攬全局。未來整個東亞研究的發展前景，恐怕不能再囿限於單一課題，而應加強不同知識領域之間的互激互礪。

從上述此一角度審視本書，我們不難理解作者以朱舜水研究為主線，擴大到中日人文學以外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的匠心獨運，實與近二十年來東亞研究及區域研究整合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大趨勢方向一致。全書可以第八章作為分界。除第一章“緒論”外，第二至七章均以朱舜水為研究重心。第八章以“戴笠”為主軸，考論中日文化交流；第九章以後則集中

圍繞日本政治、歷史、儒學、史學，而推擴到日本近代化、近代思想與東洋文化史觀的形成等問題。具而言之，本書並非集中對朱舜水與江戶儒學內部各種議題的微觀研究——如水戶學的發展、徂徠學的視野等等，而是由微觀擴大到宏觀，將朱舜水與江戶儒學的線索引入日本現代化的前奏——即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所謂“近代”時期，探討日本在此時期朝野面對國際環境的種種挑戰，如何筭路藍縷，致力從舊傳統中掙扎出一條邁入近代的道路。全書以討論《鎖國：日本的悲劇》作者和辻哲郎為結穴，實是別有寄託。在全球動盪的時代，日本近代學者揹負著舊文化包袱，對國體、文化、史觀等大問題進行深刻反思，努力轉型，汲取西學，就政制、史觀、民族觀等提出新思想。這些議題，在本書獲得充分而深刻的討論。可見本書作者宣示跨國界的文化關懷，以十七世紀的朱舜水為起點，廣泛探討三百年間中日知識菁英的活動、著作與思想，進而考論文明史觀，是多麼具有縱深而啟新的視野。

浙東學術及近世日本儒學的共同點之一是“經世致用”。受到朱舜水精神的浸饋，徐校長數十年致力於考察中國、日本及東亞文化與文明，貫串其中的也是經世致用的精神。浙東學者的“經世”，從來不局限於士大夫經綸家國的狹義解釋，而是游心寰宇，盱衡今古，汲取歷史文化精髓，為未來世局提出方向性的指引。徐校長擅用其人文關懷，延攬東亞政治經濟圈眾多傑出的人士，交流訪問，將二十一世紀東亞人文學的研究推至一個新高度。

筆者二十年前任教於臺灣大學時，已四處奔走，一力提倡“跨領域”，近年反思前半生從事浙東學術及經典文化的研究，常自憾未能更早從事於此。今睹徐校長皇皇大著問世，佩服之餘，謹從區域研究新猷、跨領域研究深化，以及儒學經世精神所涉及東亞文明新變局等幾方面，呼應本書“跨國界的文化傳釋”的主題，盼望能在有生之年，繼續與徐校長攜手努力，為東亞區域研究略盡綿薄。

香港教育大學教授 鄭吉雄

2021年9月20日

序 四

東亞文化交涉學及國際日本研究先驅

現在筆者的手邊正擺著由寧波出版社付梓的徐興慶教授(以下稱徐先生)最新大作《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的書稿。這部沉甸甸而厚實、博大精深，總計超過二十萬字的大作，是學界引頸期盼的鴻篇巨製。而且，這部書的內容不僅是徐先生多年來研究思索、多方田野文獻調查的積累，更是集結這些論著之大成，可以說是將徐興慶史學思想的精華熔於一爐。筆者忝為長期承蒙徐先生教導的後學之一，除了向徐先生，更想向學界的廣大讀者，為本書的出版誠摯地致上慶賀之意。

關於徐先生，尤其是臺灣的讀者們，實在無需筆者贅詞介紹，但是容我為中國大陸的讀者們獻上一些蕪雜之詞。

徐先生 1956 年出生於臺灣南投縣，東吳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之後負笈留學日本九州大學，並於 1992 年取得九州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以朱舜水為中心》。徐先生的學術專長是近世至近代之中日學術、思想、文化的交流史和交涉史，其次從這裡所發展衍生出來的研究領域有：日本的近世儒學及漢文學、近代東亞知識人之近代性的問題等，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透過中日兩種語言陸續刊行堅實的研究成果，徐先生在東亞地區的學術影響自不待言，他是活躍

於全世界，引領斯學、極具代表性的碩學泰斗。

徐先生已出版的專書中，以日文出版的有：學位論文的延伸之作《近代日中思想交流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4年）；極有前瞻性的探問之作《東アジアの覚醒——近代日中知識人の自他認識》（東京：研文出版，2014年）。在臺灣出版的有《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年）。除了以上三本專書，徐先生編著、合著、合編的著作有：《新訂朱舜水集補遺》（“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2，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系列的《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叢書”15，2004年）、《東亞文化交流：空間・疆界・遷移》（“叢書”72，2008年，之後收入“儒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叢書”第二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叢書”79，2008年）、《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叢書”81，2009年）、《江戶時代日本漢學研究諸面向：思想文化篇》（“叢書”82，2009年）；同為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的還有《現代日本政治事典》（“東亞文明研究資料叢刊”6，2008年）、《朱舜水與近世日本儒學的發展》（“東亞儒學研究叢書”16，2012年）、《天間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下兩冊，2015年）；以及“日本學研究叢書”《國際日本学研究的基層——台日相互理解の思索と実践に向けて一》（“叢書”1，2013年）、《轉換中のEUと“東アジア共同体”——台湾から世界を考える一》（“叢書”7，2012年）、《近代東アジアのアポリア》（“叢書”8，2014年）、《思想史から東アジアを考える》（“叢書”21，2016年）、《十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文化交流——黄檗宗を中心に》（“叢書”30，2018年）；此外，還有文獻學、史料價值極高的集成《朱舜水與東亞文明——水戸德川家的學問》（季刊《日本思想史》81特集，ぺりかん社，2014年）、《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Ⅰ：朱舜水文獻釋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Ⅱ：德川光圀文獻釋解》（同上，2014年）、《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Ⅲ：水戸藩内外關係文獻釋解》（同上，2015年）等等，總數已超過十指可數。

再者，徐先生在研究及教學方面的經歷豐富，曾任教於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和日本の天理大學等校，並且在日本的關西大學、京都大學人文

科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九州大學、名古屋大學、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中國大陸的清華大學、東北師範大學等校都有過研究和講學的經驗。此外，徐先生長期擔任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及日本語文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並創設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且於 2018 年接下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校長的大任，不管在教學或學校行政的第一線上，都以淋漓盡致的表現聞名遐邇。

此外，在研究及學術的國際交流方面，徐先生早在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及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任內，即主持領導多項研究計劃，這已無需筆者贅言。令人注目的是，在東奔西走、公務繁忙之中，徐先生於 2012 年以論文《近代日中知識人における自他認識の研究》獲得關西大學頒發的文化交涉學論文博士學位，這也是徐先生的第二個博士學位。

徐先生在國際學術交流的成就貢獻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 2015 年成立的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的五位發起人之一，與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院長朴喆熙、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徐一平、漢陽大學日本學國際比較研究所所長李康民、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長小松和彥等教授共同為該協議會的成立及營運盡心盡力。之所以成立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是因為東亞各國雖然有相當多的日本研究者，且個人或大學之間有很多的交流合作，但是不像以歐洲為主體的歐洲日本學會(EAJS)或北美的亞洲學會(AAS)那樣，不存在一個日本研究者能夠齊聚一堂、互相交流的場合。正因如此，不管在學術方面的國際交流，或是促進東亞地區民間積極交流和培養相互理解上，都非常期待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今後活躍的表現。

另外，徐先生還擔任筆者任職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所主導、日本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共同營運的“國際日本研究聯盟”的外部審評委員，承蒙徐先生平日多方的賜教與指導。

徐先生不僅上述的成就和活動深獲好評，2021 年更獲得日本外務大臣個人表彰的榮譽，表揚其對東亞學術文化交流盡心盡力的貢獻和功績。此外，徐先生也被母校東吳大學敦聘為“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Joseph K. TWANMOH Chair Professor)及日文系客座教授，同時擔任臺灣中國文化大

學董事及特約講座教授。這些都是筆者記憶猶新的美事。

今日一面拜讀徐先生大作，不禁興起很深的感觸。竊以為徐先生上述的研究活動以及社會實踐，背後似乎存在著一個重要的根基，或者說是一種通奏低音。

首先，在思想史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及人物研究的對象上，作為早期以來的題材，之後更成為研究的核心，徐先生長期關注和研究朱舜水此一人物。再者，作為研究的宗旨和方法論，同時又是研究主軸，或者可以說是某種哲學和思想，徐先生一方面揭舉了文化交涉學及東亞文化交涉學，另一方面秉持著國際日本研究乃至國際日本學的鮮明立場。

徐先生的大作同樣是以朱舜水作為研究主軸，並且納入同時期從中國到日本的隱元禪師、獨立禪師、陳元贊等人，以及作為周遭人物的鄭成功、與朱舜水交流的水戶藩及加賀藩等人士、與朱舜水的思想形成比較對照的熊澤蕃山及山鹿素行，還有那些參與《大日本史》及水戶學形成的人物系譜。彷彿在中日交流史的洪流中出現了朱舜水這號人物，並從其著作的瞬間開始就如同一道漣漪，徐徐地喚起巨大的波瀾般，激發出思想史及文化交流史、交涉史上的化學反應，並且從異文化的接觸和文化傳播、受容，像是落地生根般聯繫到了文化整合。徐先生通過細心和詳細的檢證，宏觀地揭示出這樣的理路脈絡。同時，這位朱舜水正是徐先生博士論文研究的題材，而成為徐先生無比鍾愛且尊敬的對象。

筆者寡聞，對於文化交涉學及東亞文化交涉史、交涉學等稱呼和概念在學術界有多大程度的認知和使用，並不清楚。然而，就筆者所知，這些學術概念已經慢慢地被使用、認知與共享。尤其，關西大學申請的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ICIS)在2007年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Global COE”的計劃，接著以關西大學相關人士為主體，建構了“文化交涉學”並著手規劃學會和研究組織的創設，終於在2009年成立了東亞文化交涉學會(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之後該大學也新設了文化交涉學研究中心，並設置東亞文化研究科、文化交涉學專業的研究所。

對日本而言，文化交涉學和東亞文化交涉史的稱呼及學術概念，大部分是經由關西大學及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的成員加以深化和練就的。順帶一

提，相對於過去所使用的文化交流史一般性的用法，除了異文化相互接觸與交流、傳播，更加重視以此為媒介所產生的相互影響、干涉與滲透以及文化整合等觀點，故選用了文化交涉學及東亞文化交涉史這個稱呼和概念。

徐先生的第二個學位正是此一文化交涉學（關西大學）的領域，而筆者有幸躋身前述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的發起人。然而，徐先生以朱舜水研究為主軸的學術履歷，是遠在這個稱呼及學術概念成立以前，即已具體實踐了文化交涉學和東亞文化交涉史這門學問。

此外，國際日本學及國際日本研究這個理念和名稱不用說也是晚近這幾年慢慢普及的。這是希望將日本研究從狹隘的一國史觀框架解放掙脫開來，將它重新置於廣大的東亞地區和歷史脈絡之中，同時也希望在包含東亞及歐美的全球視域之下，從人跟文化的移動、交流、越境、比較等觀點來進行探討。這同時也是排除刻板印象的日本文化論，並將日本這個對象加以相對化，而採用他者的眼光客觀理解的立場。筆者任職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正如上面所述，在徐先生的指導和協助之下鮮明地揭櫫此一國際日本研究的理念和立場，並且與國內外的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肩負起推動“國際日本研究聯盟”活動的工作。

徐先生在關西大學及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也多次就國際日本學和國際日本研究在當代社會與學界、日本與中國，進行了寶貴的倡議和演講。筆者如今恍然大悟，在這個國際日本學和國際日本研究的學術領域被提出呼籲、並且獲得社會認知的很久以前，就已經是徐先生有意識或無意識所秉持的學術立場和格局。

造就徐先生這種學術理念和格局，其本身慧眼獨具和睿智自不待言，若說是其年輕時代以來的研究材料及對象，也就是朱舜水的學問履歷及其個人的來歷所帶來的契機，亦不為過。某個意義上來說，朱舜水這個人正是親身體現了文化交涉學和東亞文化交涉史，並且具有得以成為國際日本學和國際日本研究的絕佳題材對象之經歷的人物。毋庸置疑，徐先生至今“帷幄運籌”的學術活動和社會實踐正如當代世界的朱舜水一般，跨出國境和文化圈，從東亞向世界延伸，並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恕筆者僭越，致上序言。謹此恭賀這部大作的出版，並且衷心祈願徐

先生今後益臻康泰,活躍發展,清硯文安。

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教授
日本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綜研大)文化科學研究科長、教授 伊東貴之記
日本中國社會文化學會理事長

田世民譯

2022年壬寅八月吉日

序 五

東亞的“發現”與“再發現”

生於晚明的浙江紹興學者陶奭齡曾在《小柴桑喃喃錄》中引述《南史·西南夷傳》曰：“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甚有禮文，居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叔伯姑姊妹，三日不食。中國人居喪殊草草，媿之舵矣。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信夫！”¹明末遺民朱舜水的《避地日本感賦》詩亦云：“漢土西看白日昏，傷心胡虜據中原。衣冠誰有先朝制？東海翻然認故園。”²這些能夠代表明清士人的東亞認識，一直延續到給東亞世界帶來巨大震動的日本明治維新，並在這一時期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僅使知識分子的東亞認識有了質的提升，而且出現了中、日、韓三國間的互動與互鑑。但這些認識都只能定位於東亞的“發現”階段，真正屬於東亞交涉與研究之繁榮期的是發軔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東亞“再發現”。而從東亞“發現”到“再發現”，絕不僅僅是歷史階段的跨越，更是視野、方法、理念等的顛覆。徐興慶先生稱得上是東亞“再發現”過程中的代表性學者，他的學術影響力遍及海峽兩岸、東亞世界乃至歐美國家。

說起興慶先生，我與他算得上是日本九州大學的同學。興慶先生在九大文學部國史學研究所留學時，我也在九大留學，不過是在地處六本松校

1 李會富編校《陶奭齡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0年），下冊，第348頁。

2 朱謙之編校《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87頁。

區的教養部，很少去箱崎校區的文學部，更少與國史學研究所的師生們有面對面的接觸和交流，只記得進入文學部大樓到中國哲學研究室要經過國史學研究所，按理說有不少結識興慶先生的機會，但在我的記憶中好像從未見過興慶先生，可用失之交臂來形容。沒想到離開九大後，因為朱舜水的關係，反而與興慶先生結下了不解之緣。

後來聽說，興慶先生於 1992 年以《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の研究》為題獲得了九州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作為該博士論文的副產品，興慶先生還利用假期，持續在日本發掘朱舜水的相關原始資料，尤其是十餘次前往柳川市古文書館抄錄朱舜水與安東守約的書信手跡，並經過整理編校後出版了《朱舜水集補遺》，從而彌補了由著名日本研究專家、北京大學教授朱謙之先生編校整理的《朱舜水集》的遺缺和不足。

我在九大留學期間，儘管主修陽明學，但對七十年代末就開始研究的朱舜水仍予以極大的關注。當時的基礎性資料是民國初年馬一浮編纂的《舜水遺書》以及後來出版的《朱舜水集》，因而興慶先生的《朱舜水集補遺》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後，我喜出望外，急著想買到此書，然因當時兩岸交流不暢，只好望洋興嘆，直到九十年代後期，才從大陸朱舜水研究專家李甦平教授那里得到了此書。興慶先生的這本書雖屬文獻資料類，但在朱舜水遺日文獻搜集閱讀異常困難的九十年代，對於海內外的朱舜水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海域文明史的研究者來說，顯得彌足珍貴，一時間洛陽紙貴，難得此書，是很自然的。據此可以說，我與興慶先生是由於朱舜水研究才結的緣，對他亦可謂是未見其人先讀其書。而在我的心目中，興慶先生既是學長，更是良師。

眾所周知，民國初年曾出現過一陣朱舜水熱，並一直延續到二三十年代，後因政治等原因而轉入沉寂。1949 年以後，在臺灣又出現過短暫升溫，在中國大陸則幾乎銷聲匿跡。朱舜水研究在中國大陸消沉了近半個世紀後被重新推到歷史前臺，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中日恢復邦交以後的事。在此之前，只有朱謙之等人的零碎研究對後世有重要影響。七十年代後期，國人又把注意力轉向改革開放。當時的中國大陸，出於政治、經濟等原因，其產、官、學界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對宣傳朱舜水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忱。這是因為，在向西方開放的過程中，日本是個巨大的存在，中日友好是

當時的時代主題，更是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所以當時所謂的朱舜水研究，大多是在這種宣傳中日友好、服務“四化”建設的氛圍中展開的。而朱舜水作為“中日友好的偉大使者”之形象重登當代政治舞臺的標誌，就是1982年在浙江餘姚舉行的“朱舜水先生紀念碑”揭碑式。這年的5月20日，兩年前剛訪問過臺灣的日本“朱舜水遺德顯彰會”，又組成了由時任參議院議員戶葉武為團長的代表團來餘姚參加“朱舜水先生紀念碑”揭碑式。於是，以朱舜水為載體的日本民間對華友好活動亦隨之從臺灣移向大陸。但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餘姚的朱舜水後裔赴日本為先祖掃墓的夙願，直到朱舜水逝世330年後的2011年才最終實現。

進入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朱舜水研究終於步入正常的學術軌道，取得了一批世人矚目的學術文化成果，較有代表性的事件有：1995年5月26日，朱舜水家鄉餘姚市首次派出以時任市長勵奎銘為團長的代表團，到日本常陸太田市祭掃朱舜水墓；1995年為紀念朱舜水誕辰395周年，中日兩國在上海松江縣和浙江餘姚市召開首屆“中日舜水學學術研討會”；2000年，中日兩國在上海復旦大學和餘姚市舉辦“紀念朱舜水誕辰400周年學術研討會”；2008年11月20日至22日在餘姚市召開“中日舜水學研討會”；2012年3月26日至28日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和朱舜水逝世340周年，上海松江區舉辦“明朱舜水書信展暨中日（松江、柳川）書法作品展”和“朱舜水學術報告會”，珍藏於柳川市古文書館的朱舜水書信墨蹟首次在中國大陸展出。臺灣大學亦於2010年11月5日至6日舉辦了“朱舜水與東亞文明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將舜水學與東亞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而這次會議就是由興慶先生主導的。不僅如此，興慶先生還參與了2008年餘姚市的“中日舜水學研討會”和2012年上海松江區的學術文化交流活動。換言之，興慶先生對中國大陸二十餘年來所開展的朱舜水研究也發揮過重要作用。

我還記得，2012年在松江出席紀念活動的時候，興慶先生帶著我和韓東育先生、計文淵先生專程趕往上海，與日本德川博物館館長德川真木女士策劃協商，共同促成並組織實施了在東亞世界引起較大反響的“儒學關連資料の調査研究”課題。而我作為該課題的全程參與者，在興慶先生的領導

下，獲得了一次學術提升和心靈熏陶的極好機會，並且對興慶先生尤其是他的領導協調能力也有了進一步瞭解。所以他後來出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校長，我聞後無絲毫意外感，即使憑興慶先生與餘姚因朱舜水而結下的這份緣分，其出任由朱舜水家鄉人張其昀創辦的文大校長也是合情合理的。

自 2012 年開始啟動至 2015 年結束的“儒學關連資料の調査研究”課題，是通過國際合作的形式，對原藏於德川水戶藩彰考館內的各類文獻史料進行系統調查，然後選擇其中有價值的文獻進行圖錄釋解，最後形成由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的於 2013 年至 2015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部曲”：《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 I —— 朱舜水文獻釋解》《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 II —— 德川光圀文獻釋解》《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 III —— 對外關係文獻釋解》。這是繼水戶德川家十五代當主德川圀順（1886—1969）在明治年間所作調查後的又一次系統性調查，而且把所有調查成果作了首次公開展示。毋庸置疑，興慶先生與水戶德川家十七代當主德川齊正理事長及德川真木館長組織實施的這一重大的國際文化合作項目，對世人瞭解德川博物館及其前身水戶彰考館，瞭解儒家文化對東亞社會的影響，瞭解水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乃至瞭解江戶時期的日本思想文化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數十年來，興慶先生在舜水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和在東亞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積極貢獻，為世人所稱道。而在研究領域，他的成績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朱舜水文獻資料的補遺和編纂。在這方面，除了《朱舜水集補遺》（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版）和《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版），再就是前面提到過的“三部曲”。記得那幾年每年的七、八月間，天氣最炎熱的季節，興慶先生聯絡海峽兩岸及日本本地學者，聚集於德川博物館文庫，查閱資料，拍攝照片，回臺後再挑選出有價值的文獻，分門別類，撰寫釋文，最後才形成了三冊圖錄釋解。而且這只是興慶先生所取得的第一批成果，其與武漢大學郭齊勇教授主編的《朱舜水集》（寧波出版社，2022 年版），以及筆者案頭的這部新著等第二批成果，正陸續呈現於世。二是舜水學研究。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有《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年版）、《朱舜水與近世日本儒學的發展》（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版）等。三是明末流寓日本僧

儒的研究。在這方面，興慶先生已出版了《天間老人獨立性易全集》（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版）。四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方法論研究。興慶先生在這方面的成果也有不少，在此不一一列舉。

據我所知，國內外已編纂和出版的朱舜水文獻集已達十多種，已出版和發表的研究論著有二百餘部（篇）。然而，對朱舜水及舜水學的研究，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顯不夠。興慶先生卻以一己之力，持之以恆，撐起了朱舜水研究的半邊天地。在這方面，很值得舜水學發生、經歷及傳播之主要區域的浙江學者尤其是本人學習和借鑑。

承蒙興慶先生信任，邀我為其新著《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撰寫序言。而興慶先生的新著是以“朱舜水研究的新地平”為開篇，我對此頗有同感。興慶先生此書不僅展示了在該領域的最新發展狀況，而且拓展了朱舜水研究的國際視野，稱其為“新地平”，當名副其實。

要說“新”，本書首先新在將舜水學研究擴展到朱舜水與留寓日本的明末文人交流之研究，如僧儒獨立性易（戴曼公）、心越東臯、逸然性融、澄一道亮、即非如一、化林性僕及儒醫陳元贊、陳入德等，尤其是對隱元、獨立性易的精耕細作，多見新處。其次新在將舜水學研究擴展到朱舜水與德川時期的各重要思想家、政治家的比較研究，包括陽明學者，如熊澤蕃山、山鹿素行、荻生徂徠、立原翠軒、川口長孺、藤田幽谷等。再有新在將舜水學研究擴展到朱舜水與日本地域文化、地域儒教的互動研究，如水戶藩、加賀藩等。然後新在將舜水學研究擴展到對日本的代表性史學巨著的系統研究及史觀研究，如林羅山等主編的《本朝通鑑》，德川光圀等主編的《大日本史》等。最後新在將舜水學研究擴展到日本的近代化研究，如西學東漸與日本海防政策的轉換、德川齊昭的西洋知識攝取、德川博物館所藏的蘭學及西學等相關文獻、和辻哲郎的傳統與“近代”思想的轉化等。

值此新著即將在朱舜水的故鄉寧波出版之際，我除了藉此文袒露一點自己的心得並表達對興慶先生的衷心祝賀外，還非常願意將此書推薦給大陸的學界同道，以共襄盛事。謹是為序。

浙江工商大學東亞陽明研究院院長 錢明
2022年7月3日

序 六

十七世紀東亞交流的典範

現在東亞秩序的形成可追溯到 1949 年，可追溯到 1911 年，也可追溯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如果要上推到 1868 年在日本啟動的明治維新，這些時間點都是說得過去的。上述幾個年份發生的史實影響極大，而且環環相扣，每一個年代的事件都醞釀了更大也更久遠的影響。

另外一個常被提及的年份是 1840 年（清道光二十年，日本天保十一年）。那一年發生了鴉片戰爭，十六世紀起源於歐洲的大航海時代的作用激烈地撞擊了東亞，海運東來的新時局正式揭幕展開。大航海時代預設的全球化的格局在晚明時期尚處朦朧中，它的內涵經由武力的對撞才撞開。此後，東亞不再是天下，它成為世界的東亞，東亞在歐美列強的對照下，對自己有了返身的認識。1840 年之前的東亞史基本上是發生在東亞內部的農業民族與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互動史，另外一條輔助的線索是發生在東海地區日中兩國的交流史或衝突史。1840 年以後，局勢改觀，東亞的概念正式成立，東亞要在他者的對照中了解自己。

1840 年的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但 1840 年的意義如果放在全球格局下東西碰撞的視野下定位，我們或許可以考慮之前的年代是否未曾發生過類似的文明衝突，答案顯然是是否定的，十六世紀末歐洲的傳教士與商人已來到東方，從十七世紀起，明朝官員與歐洲商人的衝突與談判已不時可見。

1644年，李自成部隊攻入北京，崇禎皇帝煤山自盡，緊接著是清軍趕走李自成部隊，再接著有為時十七年的南明抗爭，如果明鄭在臺的歲月也算進去，那麼也可以說有為時三十九年的復明運動。在這段波瀾壯闊的反抗運動中，東亞人民因經歷明清戰役、日本乞師諸多事件，因而有東亞內部的自我了解。對作為他者的歐洲之認識其實也不缺乏，1661年，鄭成功自金廈揮師攻臺，驅逐荷蘭人，臺灣的臺灣史意義、中國史意義與世界史意義在此役會合，此役就是樁指標性的事件。1637年，日本發生島原之亂，耶穌教文明與日本社會的衝突已是不可迴避的現實。這場動亂也顯示發生於日本國內的事件，其完整內涵要在更大的框架中才可得到定位。

明末清初這個時期所以可作為後1840時期的對照，乃因這兩個歷史階段的東亞都已不能在東亞內部定位自己，它們都已是世界的東亞，只是後1840時期的歷史圖像更清楚而已。但明末清初的東亞各國與歐洲列強的交往不是屈辱式的，東亞依照朝貢體制建構東亞的太平世界，朝貢制度是政治概念，也是外交概念。朝貢體制依禮的意義行事，它之所以能有效運作，背後是建立在儒教文明、佛教信仰、漢字書寫、華夏律法等等共同文化的基礎上的，沒有這些共同的文化基礎，東亞的政治秩序也就無法維持。日本當然不在嚴格的朝貢體制範圍內，但它依然是屬於東亞文明的成員。

從文明論的角度入手，我們對朱舜水在十七世紀的東亞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有更清楚的認識。朱舜水生於1600年，辭世於1682年，可以說是完整的十七世紀人。他一生七次出入長崎，三次下南洋，他對清朝、朱明、明鄭、江戶日本、歐洲海洋強權都有切身的體會，他是那個時代的國際人。國際人對自身時代的反應值得我們重視，因為身為具現實意識的儒者，他的人格即是時代精神的縮影，他有孔穎達所說的“總天下之心以為己心”的人格特質。朱舜水一生在東海兩邊參與的眾多政務遂不能以中國史的格局限定之，視野要大，它有普遍的意義。

朱舜水一生活動的意義幾乎可分成兩部分。在中土部分，他是以反抗者的身份抵抗異族的入侵；在日本部分，他是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嘗試將儒家之道落實到江戶日本的體制上來。他在中國的抗爭顯然是失敗的，他辭世隔年，南明最後的武裝抗爭力量明鄭即被施琅摧毀，明清之爭的歷史劇

至此閉幕。但他在日本的歲月因為其門生的努力，他的春秋史觀即介入了日本歷史的解釋，一種規範性的道德力量即成了歷史演變的指導原則。他對儀禮的重視也有助於禮的力量在日本的興起，包含現在位於東京湯島地區的聖廟，也是在他的理念影響下而建成的。

在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交會、遊牧文明與農業文明衝突的複雜時刻，也就是在近世東亞的黎明時期，朱舜水以他堅定的人格實踐義不帝秦的反抗精神於大明的土地，同時也持續奉獻普遍性的天下意識之理性精神於扶桑三島，仁勇兼具，雙管齊下，蔚然成為十七世紀東亞文化史的重要精神指標。十七世紀是天崩地解的年代，聖賢豪傑併出，如果說作為十七世紀動盪時代靈魂人物的劉宗周、黃道周是以深邃的思想與守死善道的人格出現於歷史舞台，那麼朱舜水則是以同樣動人的人格而又務實的大地人格往返於諸民族之間的。他們同樣是東亞精神的脊柱、變化莫測的歷史潮流中的明燈，但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十七世紀儒者的朱舜水是位國際人，在他身上，我們看到儒家精神與國際精神無縫接軌，他提供了一種典範式的國際相處之道。而接納朱舜水的日本儒者安東守約、德川光圀也是國際人，他們同樣跨越了族群與語言的限制，因道義原則而接納了朱舜水。一位異國門生會以自己薪俸的一半奉獻給一位流亡海外的大儒，一位位高權重的藩主會在朱舜水生前禮敬他，在他死後，將他安葬在自己家族的墓園，視他為家人。安東守約與德川光圀的義舉是東亞史上一則永恆的傳奇，他們的精神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他們不折不扣也是國際人，他們看到貫穿東亞歷史的道義原則。朱舜水與安東守約、德川光圀立下了中日人民交流的典範，十九世紀末以來的中日關係原本是該沿著這條道義原則往前邁進的。

徐興慶先生是華人學者中最熟悉朱舜水其人其書其思想的，他既編纂了至今為止最完整的朱舜水集，對推廣朱舜水思想也盡心盡力。同時，他也是至今為止編纂獨立性易著作最完整的學者，對獨立的一生有完整的觀照。徐先生研究東亞交流史多年，尤其熟稔十七世紀的東亞世界。本書是他多年研究的集結，讀者由此書入手，當可窺見朱舜水的精神風貌，以及那一代渡日遺民與僧侶的心事。鑑往知來，讀者了解昔日的東海風雲後，反

過來自省，應當也有助於了解我們今日所處的東亞境遇。

臺灣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楊儒賓

2021年12月18日

序 七

生命實踐的文化交流典範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治校精勤誠篤，致力推動學校的國際學術交流，成立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持續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延攬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學者，並重視新生代學者的參與，共同推廣深化東亞文化的交流，成果斐然。是以日本研究獲得日本外務大臣表彰學者中的第一位華人，可見貢獻之卓著。徐校長專治日本思想史領域多年，尤精於研究明清時期與日本文化交流有重要影響的朱舜水。《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一書，以朱舜水主張經世致用的儒學為主軸，拓展到朱舜水與日本學者在神道、朱子學、陽明學、佛學、實學等範疇的交流。用豐富的史料、嚴謹的考證，對各個歷史人物做架構完整與條理清楚的敘述，呈現出近代中日人物交流的多元圖像與意義。

朱舜水（1600—1682）為明末清初的大儒，身逢明清鼎革的亂世，早年矢志反清復明，從事日本、越南間的貿易，與鄭成功等從事反攻南京的行動，待到反清無望，才長期定居日本，與德川幕府共同推動重視人倫日用、實踐的儒學。日本以天地水土之神道為教，神道思想多元地表現在德川時期各個思想家身上，神與自然的水土等同。此種自然觀是宗教的，而非儒家哲學的天理觀。人對天的敬畏，表現在人倫日用的經驗言行上，不強調抽象的天理心性。此與朱舜水因國破家亡而痛斥虛玄天理的實學思想合

拍，適合德川幕府時期的社會政治的需要。如，藤原惺窩及弟子林羅山都有“去佛就儒”的主張。林羅山喜朱子學的“四書”“五經”，認為有利於德川幕府的教化功能。而朱舜水以開物成務、經邦弘化為學，不言朱子虛玄的天理，只強調朱子的日用倫理與道德實踐觀，正可在日本發揮其教化功能，也契合當時開始接受實用性儒學的氛圍。

日本的神道對朱子學採“捨理就氣”的態度，因五行相生是自然之道，所以神道可由氣來說，不由理來說。同樣，朱舜水所處德川時期的陽明學者，也基於自然觀的神道，對中國陽明學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等論點，將良知由形上的本體，轉換為日本式神道的、經驗的良知。朱舜水立於儒學重實際的基礎，反對由形上本體說良知，避開明末王學蹈空淪虛以至亡國的弊端。只採納以道德實踐與經驗法則為標準的良知，此種態度對日本神道的尊皇思想有相互輔助的作用。所以，如日本陽明學者中江藤樹主張，大道應按所處的時間、處所、地位的不同，如在易經六爻的升降互換中，將良知運用在倫理、政治、社會不斷變化的場域中，仍能保持良知在道德實踐中的標準性。朱舜水主張“經世致用”的實學，重視人倫與政治的互動關係。陽明學者熊澤蕃山繼承其師中江藤樹以“時、處、位”的架構，說明良知的知行合一，強調良知在倫理與政治上的關係，與朱舜水推動倫理實用性與仁政愛民、經世致用的儒學目標是一致的。

朱舜水推展實用的儒學，對於“恍惚渺茫”“喪心敗俗”的佛教，非常排斥。鎌倉時代日本佛教盛行，此時中國宋明理學亦傳入日本，日本學者多以禪學角度理解宋明理學，導致社會多流於空談。但主張實用的日本學者，如由佛轉儒的林羅山，痛斥佛教存有“非現實性”的思想而加以排斥。主張經世致用學說的熊澤蕃山，也反對百姓爭相出家。可知朱舜水在日本佛教興盛之時，推展倫理、實用的儒教，雖有困難處，仍不廢其堅持。舜水身處明清交替之時，蕃山則處於德川治世，而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主張，則是一致的。

本書資料收集非常廣博，透過對史料組織性的安排，對中日人物交流的各種情況保持客觀的立場，秉筆直書，翔實地呈現出朱舜水在日本以經世致用之學對神道、朱子學、陽明學、佛教等傳統議題的批判性的吸收與

轉化，又廣泛而多元地觀照朱舜水的實學與近代中日交流光譜中的種種異彩。如朱舜水成長於科舉鼎盛的浙江餘姚，家學有淵源，曾與德川光圀詳細說明科舉制度，唯因不喜科舉制義的華麗與不務實，而多次拒絕科舉仕途。又曾為德川光圀推展儒教，製作“學宮圖說”，對廟堂禮器的製作，大到禮樂刑政，小至制度文物的考證，莫不親力親為，以建立儒家“尊禮重道”的社會。又強調教育的重要，曾說“經簡而史明，經深而史實”，通達歷史，可通經致用。德川光圀所編《大日本史》重視社會的轉換與動向，皆與朱舜水“大義名分”的治史方法有關。反對科舉、親力親為、治史等行事，皆從不同角度，形塑出朱舜水與日本儒學互動的多種形態。

華夷變態之際，渡日的華人文士很多，境域各有不同。如獨立性易在日近三十年，輾轉於儒、佛、道、醫之間，其心境不斷轉折，與朱舜水堅持儒教的精神，恰成鮮明的對比，為中日文化交流的多元性，增添生動的生命情懷的另一頁。徐校長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走訪獨立曾走過的足跡，搜集獨立的詩稿翰墨，生動地描繪出獨立心境的轉折，以見華人東渡日本後遭遇的多元化。徐校長曾拜訪日本藏有獨立書稿的廟宇，請住持提供資料，住持堅拒不給，校長堅持一訪再訪，終於感動廟主，最後提供了珍貴資料。徐校長堅毅地推動中日文化交流，與朱舜水堅毅地推動日本實學，兩人皆“人如其學”“學如其人”，前後互相輝映，同為推展中日文化交流的典範。

本書體大思精，考證翔實，歷史人物的性格與發展躍然紙上。徐校長命我寫序，實覺無窺此書堂奧之能，難擔此重任。唯思及朱舜水重視倫理之精神，只能敬謹執筆，千祈勿有損此書之弘闊與精深於一二，則幸甚。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 王俊彥

2022年8月6日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朱舜水研究的新地平	1
第一節 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蹟與思想傳播	3
第二節 德川前期日本儒教的“雜學性”	5
第三節 水戶藩的漢學教育及其發展	7
第四節 王陽明學說在日本的傳播及演化	11
第五節 朱舜水對加賀藩的儒教傳播	13
第六節 日本的近代化及史觀的演化	15
第二章 朱舜水與留寓日本的明末文人交流	17
前 言	19
第一節 德川佛學與儒學的地位轉換	20
一、日本佛教的墮落	20
二、德川幕府的鎖國與禁教	21
三、長崎“唐寺”的設立	22
第二節 朱舜水與陳元贊、陳入德的交流	23
一、朱舜水與陳元贊——差身而過	23
二、朱舜水與陳(穎川)入德——他鄉遇故知	26
第三節 朱舜水與黃檗、曹洞禪僧——儒、佛發展一片天	28
一、朱舜水與逸然性融	28

二、朱舜水與澄一道亮	30
三、朱舜水與即非如一	31
四、朱舜水與化林性僕	32
五、朱舜水與獨立(戴曼公)——儒佛定位的爭論	33
六、東臯心越禪師與朱舜水——水戶藩儒、佛學問的弘揚者	35
結 論	39
一、從“乞師”到唱明儒教.....	40
二、儒、佛之間隱秘的鴻溝	40
三、“乞師”、唱明儒教均須後繼有人	42
第三章 朱舜水思想與德川儒教的發展	45
前 言.....	47
第一節 德川前期儒教發展的“雜學性”	47
第二節 朱舜水與水戶藩的儒教發展	50
一、興教育、行禮制	50
二、養君德、親賢士	54
結 論.....	59
第四章 朱舜水與熊澤蕃山“經世致用”思想的異同.....	61
前 言.....	63
第一節 從文獻檢視朱舜水及熊澤蕃山的實學理念	66
一、朱舜水與日本官、學界的往來書信	67
二、朱舜水的實學觀.....	68
三、熊澤蕃山的實學觀	70
第二節 從政治與道德面看朱舜水與熊澤蕃山的實學觀.....	70
一、朱舜水的仁政(愛民)觀.....	70
二、熊澤蕃山的仁政(民本)論	72

三、熊澤蕃山“言行一致”的實學觀	72
四、熊澤蕃山“空則實”的實學觀	73
第三節 熊澤蕃山與朱舜水的佛學觀	74
一、熊澤蕃山的佛學觀	74
二、朱舜水的佛學觀	75
結 論	76
第五章 朱舜水思想與加賀藩儒教的發展	79
前 言	81
第一節 奧村庸禮與《讀書拔尤錄》	83
第二節 得意門生古市務本	89
第三節 服部其衷與習釋奠禮	91
結 論	94
一、勤學勵志，興國安邦	94
二、敏求好古，仁政尊賢	95
三、做民之父母，行養民之道	95
第六章 從東亞視域看隱元、朱舜水的文化傳播	97
前 言	99
第一節 外來文化的融合與衝突	100
一、從神佛習合到神佛分離	100
二、佛寺的增加及其問題點	101
第二節 德川前期“由佛入儒”“從儒闢佛”的普遍現象	102
第三節 隱元渡日的背景及其與鄭氏一族的關係	104
一、黃檗文化在日本的傳播	104
二、隱元與鄭氏一族的關係	105

三、鄭成功致隱元書信	106
第四節 朱舜水與寺院改革的關聯性	107
第五節 朱舜水對佛教與儒教的不同論述	108
一、朱舜水的闢佛思想	108
二、朱舜水與獨立對佛、儒思想之異見	111
三、朱舜水對《三教平心論》的看法	113
第六節 改革及實踐論的闢佛現象	115
第七章 朱舜水對科舉制的評論	117
前 言	119
第一節 朱舜水遺文中述及科舉之對象與其內容	121
第二節 朱舜水的科舉經驗及對科舉制的批評	123
第三節 朱舜水個人或家族的科舉履歷	124
一、朱舜水與小宅生順的對答	127
二、朱舜水與德川光圀的對答	129
三、朱舜水與人見竹洞的對談	134
第四節 朱舜水對科舉制的批判	138
一、拒絕應考,消極抵制科舉	138
二、批判科舉	139
三、拒絕任官	140
結 論	141
第八章 “儒、釋、道、醫”的獨立與中日文化交流	143
前 言	145
第一節 戴笠的鄉里營生時期	146
一、生平傳略	147

二、戴笠同名異人考	153
三、相關先行研究	162
第二節 從戴笠到獨立性易	166
一、尋求出路時期	167
二、侍僧時期	170
三、“幻寄山房”閉關時期	182
四、行醫時期	188
五、千秋一堆土，月照冷乾坤	200
第三節 夾縫中的思想轉化	204
代結語 一腳踏破虛空，乃得遺形天地	207

第九章 《本朝通鑑》及《大日本史》史觀演化

前 言	210
第一節 《本朝編年錄》《本朝通鑑》編修的緣起與背景	211
一、林鷲峰與德川光圀對史書編纂理念的異同	212
二、《本朝通鑑》採用“吳太伯論”的真相	215
第二節 《本朝通鑑》儒教思想的內涵	218
一、鎌倉時代儒家的德治論	221
二、室町時代儒家思想的演化	222
第三節 《大日本史》的編史背景及核心史觀	223
一、德川光圀的核心史觀	224
二、安積澹泊“論贊”的史觀	225
三、《大日本史》南北朝正統、閏統的史觀	228
四、《大日本史》為何以漢文撰寫？	229
五、《大日本史》的編纂與朱舜水有關嗎？	230
結 論	232

第十章 《大日本史》與日本“水戶學”的重建 237

前 言..... 239

第一節 《大日本史》與水戶學..... 240

一、《大日本史》的國體觀..... 241

二、《大日本史》與中國儒家思想..... 243

第二節 水戶學與古學的關係..... 244

一、山鹿素行與朱舜水..... 244

二、山鹿素行與德川光圀..... 245

第三節 徂徠學在水戶藩的萌芽..... 247

一、一元到多元學問的發展..... 248

二、徂徠學有無影響水戶學..... 250

第四節 立原翠軒與“中期水戶學”的再興..... 252

一、立原翠軒的學問形成..... 252

二、川口長孺與歷史書的編纂..... 255

三、立原翠軒與水戶藩的對外危機意識..... 257

第五節 藤田幽谷與立原翠軒思想的不同..... 258

一、《大日本史》的三大改革議題..... 259

二、《大日本史》的“論贊”爭議與更名《史稿》..... 260

代結語 水戶學對近代日本的歷史意義..... 262

第十一章 水戶藩與日本的近代化 265

前 言..... 267

第一節 西方勢力的東漸與日本海防的政策轉換..... 270

一、立原翠軒的憂患意識..... 270

二、德川齊昭的《北方未來考》..... 270

三、“天保改革”及維新思想的萌芽..... 271

四、鴉片戰爭與對英的危機管理..... 272

五、洋式造船與海軍傳習所的設立	273
第二節 水戶藩的軍事教育和近代化建設	275
一、水戶藩的私塾教育	275
二、藩校“弘道館”的強兵教育	276
三、德川齊昭的“神發流炮術”和《烙丸全備》	276
四、水戶藩的反射爐建設	277
第三節 德川齊昭的西洋知識攝取	279
一、“伊祇利須風說”的英國資訊	279
二、《西洋商舶原始并諸說·全》的西洋航海貿易情報	280
三、《中濱萬次郎口書》的美國與呂宋島情報	280
四、各藩大名的“蘭書”借閱	280
第四節 德川博物館所藏的蘭學、西學相關文獻	281
一、荷蘭文獻	281
二、漂流民文獻	272
代結語 水戶學與明治維新	283
一、水戶學的維新思想與精神如何解讀	283
二、德川慶喜與大政奉還	285
第十二章 和辻哲郎的傳統與“近代”思想的轉化	287
前 言	289
第一節 “鎖國”與日本的悲劇之關聯性	291
一、傳統的回歸與批判	291
二、文化與精神的暗殺	293
三、基督教的合理主義	293
四、“鎖國”的功與過	294
第二節 尊皇思想與儒教批判	295
一、藤原惺窩	296
二、林羅山	296

三、中江藤樹.....	297
四、山崎闇齋.....	298
五、熊澤蕃山.....	299
六、山鹿素行.....	299
七、德川光圀.....	300
八、賴山陽、會澤正志齋.....	301
第三節 文化層次的影響、非影響.....	302
第四節 重建“日本文化”與“近代”思想轉化的關聯性.....	303
結 論.....	305
初出一覽.....	307